

The Age of Friction?

China and the New Changes
in the World Economy

◎ 董彦峰 编著

新变局

中国与世界经济

大摩擦时代 来临？



经济管理出版社
JINGJI GUANLI CHUBANSHE

The Age of Friction? 大摩擦时代 来临？

中国与世界经济新变局

China and the New Changes
in the World Economy

◎ 董彦峰 编著



经济管理出版社

ECONOMY & MANAGEMEN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摩擦时代来临? ——中国与世界经济新变局/董彦峰编著. —北京: 经济管理出版社, 2018. 12

ISBN 978-7-5096-6253-3

I. ①大… II. ①董… III. ①中美关系—双边贸易—研究 IV. ①F752.7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285346 号

组稿编辑: 张 艳

责任编辑: 张 艳 乔倩颖

责任印制: 黄章平

责任校对: 王淑卿

出版发行: 经济管理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北蜂窝 8 号中雅大厦 A 座 11 层 100038)

网 址: www.E-mp.com.cn

电 话: (010) 51915602

印 刷: 三河市延风印装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20mm×1000mm/16

印 张: 18.5

字 数: 266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096-6253-3

定 价: 49.80 元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凡购本社图书, 如有印装错误, 由本社读者服务部负责调换。

联系地址: 北京阜外月坛北小街 2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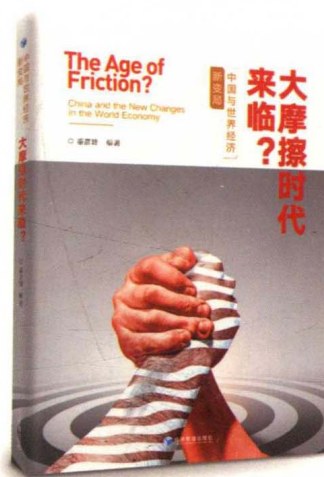
电话: (010) 68022974 邮编: 100836

作者简介

董彦峰，先后毕业于北方工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高级工商管理硕士。曾为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中国市场营销研究中心（MRCC）重点课题“中国城市营销发展报告”课题组核心成员。

关注国家发展战略、中美经贸关系、软实力及热点经济问题，旁涉中西历史文化。

主要致力于国家、城市及企业发展战略等方面的研究，曾主持、参与部分城市发展及品牌规划项目，指导、参与多家企业的发展战略、品牌营销咨询等。出版专著《坎坷的强国之路》，合著《中国城市营销发展报告》等。



责任编辑：张 艳 乔倩颖

封面设计： **芬理品牌设计**
[QQ: 280372095]

前言

我不讲假话，但也没有讲出所有的真话。

——康德

……未来与而今，大大不同，这一看法，令人厌恶反感，与传统思维和行为方式格格不入，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在实践中按照此一看法行动。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当前国际社会风起云涌、诡谲多变。特别是自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中美这两个经济体量位居全球前列的大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对全球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都产生了极大影响，对国际贸易规则也造成了严峻挑战。

中美贸易摩擦是一个敏感而又纠结的话题。敏感在于既影响家国大计，又牵涉芸芸众生。

特朗普自上台以来，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行政命令，如退出 TPP、修筑美墨边境墙、“禁穆令”、废医改和减税等，呈现出一种“四处出击”的态势。美国的这些政策变化势必给美国经济、世界经济、中美经贸关系以及中国经济带来巨大影响。

过去的一年，世界经贸领域的热点莫过于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后发生的贸易争端。中美贸易摩擦，为原本就饱受经济金融危机拖累的世界经济注入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因素。可以预见，未来较长的一段时期，对于中美

经贸乃至全球经贸来说都将是多事之秋。2018年3月以来，随着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发起的单边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加码，中美贸易摩擦也愈演愈烈。

2018年9月18日，美方宣布自2018年9月24日起，对华200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为10%，2019年1月1日起上升至25%。“此外，如果中国对我们的农民或其他行业采取报复行动，我们将立即实施第三阶段，即对大约2670亿美元的额外进口征收关税。”随后，中国商务部发表声明，“中方将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这是继2018年8月23日美对华160亿美元进口商品征税生效之后，双方再度强力交手。

对于中美双方如此快速、如此强硬、如此大规模地在经贸领域针锋相对，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大家的预期。随着事态的发展，对中美贸易摩擦长期性和严峻性的认知也逐渐被人们接受。

中美贸易摩擦有着复杂的背景，是中美两国经贸长期不平衡所致，与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美国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抬头有着重要关系。同时，也与美国全球竞争力下降带来的焦虑有关，并且与美国的国内政治、国际治理的弊端以及特朗普总统个人的治国理念均有关系。因此，解决贸易摩擦也不仅仅只是贸易的问题。

客观地讲，中美当前的战略互疑、紧张和冲突，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认知：一是因为中国自身实力迅速提升引发美国“权力转移”的焦虑；二是中美双方经济模式的差异所引发的“交易公平”及对国际规则的认知差异。这两个问题在中美关系中一直存在，只是最近才被认为是两国之间根本性和战略性的矛盾所在。

“二战”后的世界经济增长、稳定与繁荣得益于世界各国对国际规则的尊重与践行。中美只有将贸易摩擦放置在多边规则体系之下，才有助于真正解决问题；只有回归多边规则，才能有效“规制”大国的“越轨”行为，进而培育良性竞争关系，求同存异，共谋发展。2018年将会被中美两国所铭记，亦将被全球治理研究者所铭记。因为在这一年里，以中美关系为代表的大国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发生了质变，双方能否有效管控风险、回归多

边、重塑基于规则的良性竞争关系，终将决定全球治理的何去何从。

一、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温

2017年8月，上任不久的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对中国开展“301调查”。2018年3月，USTR发布了调查结果，即《基于1974年贸易法301条款对中国关于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和创新的相关法律、政策和实践的调查结果》（以下简称《301报告》），特朗普据此对中国发起了贸易制裁。

美方《301报告》分为六章，对中国展开五项指控，包括不公平的技术转让制度、歧视性许可限制、政府指使企业境外投资获取美国知识产权和先进技术、未经授权侵入美国商业计算机网络及其他可能与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领域相关的内容，为美国特朗普当局单边挑起贸易摩擦提供了依据。

2018年6月15日，白宫对中美贸易发表声明，拟对1102种产品合计5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25%的关税。第一组中国关税涵盖340亿美元，于7月6日12时正式开征。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同时对160亿美元的第二组关税进行进一步评估。

6月16日，针对美国6月15日的决定，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决定对原产于美国的659项约500亿美元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其中对农产品、汽车、水产品等545项约340亿美元商品自2018年7月6日起实施加征关税，对化工品、医疗设备、能源产品等114项其余商品加征关税的实施时间另行公布。

6月18日，美国宣布，如果中国保护，就考虑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额外征收10%的关税；如果中国再反击，则要对另外200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追加额外关税。这基本实现了对中国出口美国商品的全覆盖。根据美方统计，2017年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5056亿美元，美国对中国贸易逆差3752亿美元。

6月27日，美国有媒体报道，特朗普要求议会立法禁止中国对美国技术产业投资。后来，美国政府澄清是误传，并指出，美国政府要求议会运用现有手段，强化对未来技术投资的审批。

美国于当地时间7月6日起对第一批清单上818个类别、价值34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作为反击，中国也于同日对同等规模的美国产品加征25%的进口关税。

美国于8月8日又宣布，对华进口500亿美元商品中剩余的160亿美元加征关税，并于8月23日实施。中国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发布将对美160亿美元商品加征关税，8月23日实施。

8月1日，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发表声明，拟将对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税率从10%上调至25%。8月3日，中国商务部发布公告，回应将对美600亿美元商品加征5%、10%、20%和25%的关税，实施日期视美国而定，中美贸易摩擦再次升级。

9月12日，美方主动提议与中国进行新一轮贸易谈判，并声称其目的是在美国对进口自中国的商品加征关税之前，给中国提供一个解决中美贸易争端的机会。9月13日，中方商务部回应称，中方对此持欢迎态度，贸易冲突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

9月18日，美国政府宣布自9月24日起，对约2000亿美元进口自中国的产品加征关税，税率为10%，并将于2019年1月1日起上升至25%；还称如果中国针对美国农民或其他行业采取报复措施，将对约2670亿美元的中国产品加征关税。中国商务部当日回应，为了维护自身正当权益和全球自由贸易秩序，中方将不得不同步进行反制。

10月4日，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就美国本届政府对中国的政策发表讲话，矛头直接对准中国。

11月7日，在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美国前财政部长保尔森警告，如果美国和中国未能解决战略分歧，两国之间的“经济铁幕”将导致世界分裂。

夹杂着复杂因素，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不断升级。未来的局势将如何演进？中美两国能否妥善解决贸易争端？世人将拭目以待。

二、五种流行观点

面对如此复杂的中美关系，究竟该如何处理？

目前，中美贸易摩擦已呈常态化趋势。此次中美贸易摩擦其规模已经超越以往包括反倾销、反补贴以及“双反”等在内的摩擦。如果未来进一步持续下去，将对中美双边经贸极其不利。这次由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美国处处主动，中国处处被动，美国正试图通过贸易争端从心理上对中国实施攻击，借力“羊群效应”进而挤爆中国债务或房地产泡沫，并发起股市摧毁战，以此打击中国经济。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对于这一态势，当前比较流行的有五种观点：妥协论、强硬论、无视论、折中论和持久战论。

第一种观点是悲观的“妥协论”，面对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该观点认为只要中国服软妥协，就能避免、化解矛盾。

此种观点认为，美国自然资源的禀赋使得其在封闭条件下也能发展，而中国的资源严重依赖外部：最尖端的技术大多掌握在美国人手中；中国的外汇绝大部分来自美国，没有这些外汇，必需的粮食、石油和芯片等都无法进口；此外，美国还拥有众多的盟友，离开中国，虽然经济也会受到打击，但仍有广大的市场，而中国则没有美国如此好的条件。

“妥协论”者认为，如果贸易摩擦进一步加剧或发生全面的贸易冲突，对于美国经济来说至多是重创，而对中国来说则是生存问题。

当年，日美贸易之争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末，历时30年，先后涉及纺织、钢铁、家电、汽车、电信、半导体等领域，一直到1985年签订《广场协议》。1989年签订《日美结构性障碍协议》。日方节节退让甚至无原则顺从，但美方却步步紧逼，直到日本应对失当、国内资产价格泡沫崩盘，日本金融战败，陷入失落的20年，再也没有能力挑战美国经济霸权，日美贸易争端才宣告结束。

其实，美国对中国经济崛起的战略遏制，不是中国妥协、让步所能解决的。早在奥巴马政府时期，美方就大力推行“一体两翼、两翼张开”（TPP、TTIP）的经济战略，以及“战略东移”的军事战略。这次中美贸易摩擦，则是过去多年美方遏制中国崛起战略的延续和升级。

第二种观点是比较主流的“强硬论”。认为中国已经强大起来，有实力

在经济、金融、资源、舆论、地缘政治等领域对美方全面开战。这种观点既是中国经济发展带来自信的体现，也是个别人由于缺乏理性思考进而表现出来的蛮干与自我膨胀。对于中美贸易摩擦，有理、有利、有节，策略性地反击无可厚非。但是，有一种思潮是把当前的中美贸易摩擦引向了狭隘的民族主义、所谓的“爱国主义”甚至民粹主义，这点则要警惕。我们知道义和团当年盲目排外、灭洋，貌似很爱国，结果却引来祸害。

第三种观点是“无视论”，认为中国应采取“无视”态度，对美国挑起的贸易争端采取冷处理。这种观点认为“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对我国需要进口的商品，按正常程序进口，以价格最低为原则，并不排斥从美国进口。这种观点认为中国要把主要精力放在做好自己的事情上，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建设高水平市场经济和开放体制，建设自由平等以人为本的社会，以期中国的世界观和意识形态自然而然地得到世界的认同。

但是这种“无视论”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中美贸易摩擦是美国战略思维转变的产物，一方面源于巨额贸易逆差及其结构性体制性问题和分歧，另一方面源于美国对新兴崛起大国的遏制。中美贸易纷争是客观存在的，中国不仅要集中精力做好自己的事，还要保持战略定力，沉着冷静，理性应对中美贸易纷争。

美国时间 2018 年 10 月 4 日中午，美国副总统彭斯在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Hudson Institute）发表了一场“政府对华政策”的演说。这场演说被国内一些人称为特朗普政府拉下了“新冷战铁幕”。彭斯对中国的指责集中于中美贸易（中国搞不公平竞争，窃取美国高新技术等）、中国道路（没有按美国的预想走向西方自由民主的道路）、中国人权（“迫害”国内少数民族、干涉宗教和言论自由）、中国军力（中国最近几年扩张军备，危害世界安全）。这些都是美国的惯性思维，其实也是老生常谈，并没有新意。但是我们要看到，美国矛头所指向的已经不仅仅是贸易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不可能采取“无视”的态度。

在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初期，对于把谁作为主要对手是有一番犹豫的。最初基本是把恐怖主义作为主要对手，直到发表安全战略报告之时，才开

始把中国作为头号对手。

2015~2016年美国国内曾发生了一场对华政策辩论，形成的倾向性意见是，过去多年历届美国政府奉行的既接触又遏制的对华政策犯了错误，被中国“稳住美国”的战略迷了眼，实际上帮助了中国的崛起。随着中国开始在国际体系当中逐步排斥美国的影响力，美国应该采取措施扭转这一趋势，因此，无论是特朗普还是希拉里当选，美国的对华政策都会发生比较大的调整。

同时，美国更加明确地意识到“时间在中国一边”，中国可以等待，美国不可再拖延。以经贸为切入点加强对华遏制，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是美国的战略意图。特朗普政府的关税“紧箍咒”只是初招，其后必有杀招。这种贸易惩罚姿态与美国国内的税收制度改革和加息、缩表进程相配合，辅以向美国其他主要贸易伙伴进行政治施压，实际上吹响了美国拉帮结派打压中国、全球投资从中国市场撤离的号角，针对的是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

但资本有着趋利的天性，加速离开中国市场的不仅是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也包括早已开始向印度和东南亚国家转移的低端加工制造业。这样一方面可以起到在战略上、经济上弱化中国发展势头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帮助中国的邻国“平地起高楼”，增加与中国相抗衡的资本和筹码。一旦中国经济陷入长期下行的轨道，很多连带效应有可能成为“不能承受之重”。

因此，中美之间的斗争有一定的必然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无视这些问题，那么“无视论”显然是一种一厢情愿的“鸵鸟”行为。

第四种观点则为“折中论”。这种观点无非是妥协论、强硬论、无视论等观点的“折中”，强调在不同的阶段，采取不同的策略。这里不展开论述。

第五种流行观点称为“持久战论”，这种观点与当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前美国对华出现了战略转向，遏制中国成为重要目标。在对华的强硬上，共和党、民主党形成了合流，达成了罕见的共识。特朗普周围的决策层几乎是清一色的对华强硬派，因此在今后较长一段时期内，中美必然

过招。在此意义上，中美贸易摩擦既是遭遇战，也是持久战。这场涉及上千亿美元、规模史无前例的贸易纷争，从长远的历史来看，可能是蝴蝶轻轻扇动翅膀，背后却酝酿着一场风暴。

这场贸易之争，从一开始就绝不仅仅是贸易争端，而是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主导权的争夺。对于美国来说，哪个国家的发展势头上升得快，谁的实力接近它，谁对它的霸主地位威胁大，就必然会成为被打压、遏制的对象。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巨大体量，已经让美国“寝食难安”。自“二战”结束后美国登上世界霸主宝座 70 多年的历史，苏联、德国和日本也都曾享受过如此被打压的“待遇”，只不过抗争的结局都是以美国如愿以偿而结束。

中美贸易之争只是一个开端，从此开启的中美新博弈将是一个长期艰苦的历程。毕竟美国手中还握有政治、军事、金融、科技、话语权等方面的相对优势。对中国而言，化解贸易摩擦、调整好与美国的关系，任重而道远。

三、中国需要冷静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两年来，中美关系经历了“过山车”般的变化，至今仍然方向不明。迄今为止，特朗普对中国的政策和做法发出了混乱的信号，其中既有某些始终如一的坚持，也有频频表现出来的反复无常。特朗普在竞选阶段对中国口诛笔伐，但当选后对自己之前一些耸人听闻的说法进行了修正，这种表面上的热情在 2017 年 11 月特朗普访华的盛大场面中达到高峰。

就具体政策而言，特朗普一开始并没有直接针对中国，而是以一系列动作撼动和破坏与其传统盟友的关系，包括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关于气候变化的《巴黎协议》和《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先下手对加拿大、日本和欧盟产品课征关税等，以及对长期以来被视为体现西方自由国际主义理念和制度优越性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大加鞭挞。

虽然中美贸易争端只是特朗普挑起全球贸易争端的一部分，但它在媒

体、学界和公众中所引起的关注却是最多的。在中国媒体上的激烈讨论中，许多人认为这是特朗普精心设计的对中国经济的“绞杀”计划，还有一些名家甚至称中美已经由此进入了“新冷战”时期。

面对如此纷繁复杂的乱象，中国更需要理性面对，特别要冷静地看到以下几点：

第一，虽然中国的经济总量排名全球第二，并且有可能在未来超越美国，但中国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的全球竞争力和号召力上还不够强，特别是科技创新力仍与美国有较大的差距，许多核心的技术仍然掌握在美国手中。同时，外资公司的撤离也将延缓中国在许多高科技领域追赶的步伐，中国要想实现“中国制造 2025”的战略目标还有艰难的路要走。

第二，虽然美国对中国虎视眈眈，但中国早已深度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各项战略资源和整体经济对外依存度很高，与美国进行博弈往往是两败俱伤。同时，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也不可能重新关上。

第三，尽管不少邻国在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度较高，中国通过“一带一路”也交了不少朋友，但许多跟中国友好的国家，仍然摆脱不了对美国的依赖，或心理上的依赖，它们的政治意志在特定情况下并不完全可靠。在当今国际政治格局下，如果中美陷入长期固化的“新冷战”状态，不仅日本、韩国会更加坚定地跟着美国走，许多其他国家未必与中国同心。虽然目前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取得了重大成就，团结了沿线许多国家，但中国要想在中美争端中取得大部分国家的支持，难度还是很大的，特别是世界主流国家的支持。

第四，中国虽然发展迅速，但国际环境仍然错综复杂，国内发展不平衡的矛盾仍比较突出，国内经济亦有下滑的迹象。中国要想保持此前多年的发展态势，难度不小。

第五，2017 年中国人均 GDP 超过 8800 美元，还没有到 1 万美元，按照目前的发展速度，2022 年或成高收入国家。而发达国家人均 GDP 一般在 4 万美元以上，美国是 5.8 万美元，欧洲有些国家则超过 8 万美元。从整个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中国现在仍然是个追赶者。从 1 万美元到 4 万美元，可以

从发达国家寻找经验，有很多东西都要学习，学习的基础打牢了，将来才能创造出更新的东西来。我们虽然强大，但尚未成“引领者”。

此外，中国并未完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南美洲阿根廷等国家一度进入发达国家的边缘，但是此后多年一直在中等收入国家水平徘徊。中国能否成功转型有待努力。

中美之争，对美国而言也是把“双刃剑”。“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美国要想对付中国，成本太大，风险太高。因此，在很多问题上美国只能尽量同中国磋商解决，进而合情合理地重新分配利益。

其实，中、美经济各有优势，是可以互补的，但美国刻意破坏这种互补关系，同时无视中国为中美经济平衡所做的努力，这正说明美国另有企图。所以，美国施压中国的手段不断升级，变本加厉。中国不仅需要提防美国，更需要实实在在的应战策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制裁，不仅是经济层面的，更有心理层面的。美国试图通过贸易手段从心理上对中国实施攻击，借力“羊群效应”挤爆中国债务和房地产泡沫，摧毁中国的股市，进而打击中国经济。对美国，我们绝不能掉以轻心。

中美贸易及其他领域的争端虽然难以避免，但两国有高度依存的经济，处理不好很可能导致两败俱伤，没有赢家。中与美，都需要重视对方的核心利益，避免误读、误解、误判对方的真实意图。中国与美国的渊源颇深，最早可追溯到清朝乾隆年间。中国与美国，也并非天然的敌手，在历史上中美之间合作是大于摩擦、对抗的。

四、中美贸易摩擦不同于“冷战”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教授认为，中美贸易争端如果失控，可能“演变成技术冷战甚至新冷战，就意味着现存世界秩序的解体”。官方媒体也对此不再讳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际在线一篇评论文章就称，“抗击美国贸易战，对中国而言是一场‘国运之战’”。

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最大的外部因素始终是美国，最优先要处理的也始终是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中有诸多层面，但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看，

大致可以简化为两个要素：经济合作的要素与地缘政治角色的要素。对这两个要素的轻重权衡，贯穿于两国领导人如何决策开展双边关系的始终。

虽然说中美之间结构性矛盾是不可避免的，一场遏制与反遏制的斗争必然会上演，但这场贸易纷争与当年美苏之间的“冷战”无论在形态上还是在内容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

第一，此前已论述，中美彼此高度依存，经济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这种情况是当年的美苏“冷战”不可比拟的，性质亦是根本不同的。

第二，虽然美国已将中国定位为竞争对手，试图通过贸易手段对中国实施全方位的遏制，但中美之间并不具有打垮、压垮对方的根本战略目标，二者之间存在竞争，但不是生死之争。

第三，中美两国在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国安理会等现行国际体系机制内开展对话与合作，而非全面的对抗。目前还只能说是“贸易摩擦”，而非真实意义上的“贸易战”。

第四，当年美苏争霸，拉帮结派，分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彼此尖锐对抗，但目前的中美贸易争端是合作中出现的问题，而非“针尖对麦芒”的对抗。

第五，中美之间在意识形态上虽有差异，但并没有像当年美苏一样输出思想，输出战争。

我们要意识到，目前全球化的世界经济使“新冷战”不具备产生的条件。如果中美真的陷入“新冷战”，那对整个世界都将是灾难。

假如中美真的进入“新冷战”，这也意味着中国在外环境上进入一种险恶境界，因为“冷战”必然意味着对立的双方要使用相当比重的资源来削弱对方，而不是凝聚于本国自身的建设和发展。如果这种局面发生，必然是中美两国国运的悲哀，对全世界来说也是不祥之兆。

但发生这种局面的可能性很小，世界经济进入深度的全球化，各主要经济体和所有的大国都已经卷入全球经济，形成互相依赖的局面。换句话说，中美两国的繁荣，是以对方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为前提的；削减、摧

毁对方，最终牺牲的也是本国的经济和民生。因此，中美之间“冷战”的前提是不存在的，任何一方要发动这样的“冷战”，最终是无利可图的，形同自杀。而间歇发生的贸易摩擦（有时被称为“贸易战”），其实反倒是经济联系密切的贸易伙伴国之间和平博弈和沟通的方式。

五、中国有信心

作为世界上两个最大的经济体，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

从目前形势来看，美国肆意挥起单边加征关税“大棒”的做法，必将对经济全球化造成危害。中国站在维护多边体制和国际经贸秩序、维护中国利益的坚定立场，为捍卫自由贸易始终保持克制和理性应对。

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中美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和经贸竞争性的增强，贸易摩擦具有长期性和日益严峻性。如管控失当，中美贸易摩擦全面升级，不排除后续扩大到金融战、经济战、资源战、地缘战等，进而美方动用贸易、金融、汇率、军事等手段全方位遏制中国崛起。今后，中国应对的就不仅仅是贸易之争，还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网络、意识形态等领域的全方位综合实力较量。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做好积极应对的准备，做最坏的打算，同时也应该有足够的信心。

第一，过去40年来，中国经济年度增长有高有低，但总体保持了高速发展水平。1978~2010年，平均年增长率达到10%。从2011年起，在复杂严峻的国内外环境中，经济下行压力增大，至2016年仍然保持了平均增长7.6%的水平。2017年出现逆势回升，达到6.9%，2018年上半年同比增长6.8%。中国的经济增长来之不易，这是在国际经济发展处于低迷状况下实现的。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除2010年增长指标有些反弹外，世界经济发展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增长缓慢，相比较而言，中国经济的高增长显得十分亮眼。

第二，中国的市场经济主体地位已经形成，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正在凸显。